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丛书

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简史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简史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津人民抗日斗争简史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8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丛书)

ISBN 978-7-201-09590-5

I. ①天… II. ①中…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天津
市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7872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澳中讯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字数: 330 千字

定价: 58.00 元

编审委员会

主任：刘润忠

委员：于 建 王永立

王凯捷 门跃军

王凯捷 著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的野心	(1)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
二、从觊觎天津到铁蹄入侵	(5)
第二章 日本吞并华北的阴谋与天津人民的斗争	(17)
一、天津事变	(17)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7)
三、吉鸿昌与天津的抗日救国运动	(48)
四、红军长征在天津的反响	(52)
五、刘少奇与天津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的开创	(58)
第三章 天津沦陷	(70)
一、日本侵华战争步步升级	(70)
二、从七七事变爆发到天津沦陷	(83)
三、党在天津抗战中的策略转变	(94)
第四章 日本对天津的殖民统治	(103)
一、日军对天津的控制与掠夺	(103)
二、天津的日本占领军	(117)
三、为虎作伥的伪军	(123)
四、东方“盖世太保”	(128)
五、天津事件	(132)
六、日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39)
第五章 党领导下的天津城市抗日斗争	(149)
一、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	(149)
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58)
三、平津塘沽工作委员会	(162)
四、党的沦陷区工作方针与策略	(166)
五、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下的天津对敌斗争	(178)

六、天津敌后抗日斗争的战果	(187)
第六章 天津周边的抗日斗争	(196)
一、冀东抗日暴动与天津	(196)
二、盘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206)
三、天津抗日游击区	(215)
四、根据地的党政建设和大生产运动	(221)
五、反“扫荡”斗争	(225)
六、天津的津南支队与武工队	(236)
七、天津军民的抗日大反攻	(239)
第七章 天津社会各界的抗日斗争	(251)
一、各界民众的斗争	(251)
二、在津国际友人对抗战的贡献	(267)
三、国民党在津的抗日活动与日本士兵的反战行动	(274)
第八章 天津抗战的历史地位	(279)
一、天津抗战的作用	(279)
二、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288)
三、天津抗战的深远影响	(292)
主要参考文献	(300)
后记	(303)

第一章 日本的野心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邻的岛国。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治维新成为日本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此后，日本逐渐步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对外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特别是侵略中国的欲望愈益膨胀。1894年，日本经过长期准备，与中国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随后，日本与清朝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开始了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罪恶勾当。天津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是日本妄图侵占的地区之一。日本把天津作为由本土渡海侵入中国内地、独占中国的最佳登陆点。此后，日本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始了对天津的入侵。但是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天津人民，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868年，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改革运动——明治维新。这场改革运动的结果是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宣布由天皇睦仁“亲自执政”，组成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和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它通过取消封建领地制度、地税改革等众多措施，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是与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带有军事性、封建性的特点分不开的。日本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直接影响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本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大商业资本家

长期以来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和下级武士结成联盟，并让这些人掌握了实权。因而，资本主义改革极不彻底，无论城市和农村都保存了浓厚的半封建关系。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明治政府便竭力扩展军事力量，强化国家机器，以镇压人民的反抗，并妄图利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当日本开始发展资本主义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加紧发展军事力量，急起直追，狂热地参加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它妄图靠侵略中国、朝鲜等邻国来扩大海外市场和弥补国内财政资本的不足，并以此作为对英、法、美等国的补偿。

当日本大力推进军国主义政策时，远东地区已成为资本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英、美、德、法等国在远东地区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和斗争，给日本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了可乘之机。美国为了同英、俄争夺中国和朝鲜，力图扶持和利用日本。英国为了维护和扩大它在远东的殖民利益，对抗沙俄势力，也拉拢和支持日本。明治政府利用这种情况，一面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屈从，求得它们的支持和庇护；一面则加紧准备，制造事端，对中国、朝鲜等邻国发动侵略战争。

1871年7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城、外务大臣柳原前光来中国，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会谈。9月，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统称《中日修好通商条约》）。谈判过程中，日本政府一开始就要求按“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企图向清政府索取“一体均沾”等侵略特权。但当时日本羽毛未丰，缺乏足够的实力以迫使清政府依从，结果所订条约是对等的。对此，日本政府深为不满，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修订条约。清政府答以“两国初次订约，最要守信”，未允改约。然而，日本政府企图在中国攫取与西方国家同等的侵略特权的阴谋并未由此收敛，它不惜用武力逐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

此后，日本加快了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步伐。为此，日本首先准备吞并的目标是琉球群岛和台湾。1872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册封琉球王为日本藩王，准备吞并琉球；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以大隈重信为长官的台

湾事务局，在长崎设立侵略台湾的军事基地；又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准备进攻台湾。1874年5月22日，西乡从道率领日军3000人在台东登陆，大肆烧杀抢掠。高山族人民奋起抵抗，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日本第一次企图入侵台湾的阴谋失败。

1879年，日本正式以武力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它进一步鼓吹“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所谓大陆政策，准备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1890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友朋在第一届国会上的施政演说中，公然宣称“国家独立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这里所说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正是基于这种强权理念，日本才敢于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开始走上大规模侵略扩张的道路。

为独占朝鲜，将清政府势力排挤出去，1885年2月24日，日本委派参议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3月14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会谈，4月18日，签订了《日清天津条约》。条约主要条款为：“日清两国自签约之日起，在四个月内，由朝鲜撤军；尔后两国均不向朝鲜派遣军队之教官；两国遇有出兵之必要时，应互相照会。”^①该条约看似较和缓，但中国作为朝鲜的保护国，从此失去了对朝鲜独有的保护地位，并为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894年（甲午年）夏，日本发动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并且使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进而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进入中国境内烧杀抢掠。在这种形势下，1895年2月中旬，在美国的调停下，清政府按照日本政府的指定，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日本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和城镇，随便设立工厂，制造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除此之外，日本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9页。

还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强迫清政府于1896年7月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1896年10月又订立中日《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承认日本可以在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四个新增口岸以及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地设立租界。1899年,又迫使清政府同意在福州设立日租界。

《马关条约》是日本在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纵容和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它的订立,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直接助长了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野心,成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新的割地狂潮的开端,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

自此,日本有恃无恐,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在侵占台湾为殖民地后,又通过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取得了独占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为遏制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兴起,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山东后,又把侵略目标指向全中国。他们利用袁世凯企图称帝的迫切心理,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在日本的威胁下,袁世凯完全屈服,于1915年5月9日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极力扶持中国的反动军阀势力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干涉中国革命。1925年五卅运动时,日本指使奉系军阀残酷镇压中国革命运动。1928年5月,为阻止北伐军进入山东,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青岛、济南增派军队,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18日,日本政府发表《维持满洲治安宣言》,叫嚷“中国战事即将波及北京、天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就要“采取适当和有效的措施”。由于日本政府推行了扶持军阀势力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频繁的大规模混战,日本利用自己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军阀和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干涉正在兴起的中国革命运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延伸到平、津、东北、上海、福建等地区。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骤开始实施,而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则是愈来愈深重的灾难。

二、从觊觎天津到铁蹄入侵

日本对天津早就抱有占有的野心。1900年，随着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人侵，日本依仗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对天津进行了野蛮的侵略和占领。

1. 隼覬天津

由于天津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自近代以来，它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关注”的目标。特别是日本，对天津更是垂涎已久。由于日本与天津的海路交通便利，更因为天津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因而长期以来始终为日本所觊觎。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东南沿海一带时，就对天津重要的战略作用进行过表述，指出：“天津登莱沿海（指由今天津港出海到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笔者注）抛荒地土。春夏责其耕耘。秋冬教其技击。各处之地，不下数百万顷。”^①其对天津的垂涎可见一斑。明代赵士桢在《日本犯华考》中曾就当时倭寇对天津等地的觊觎一针见血地指出：倭奴“攻破朝鲜，将王子陪臣，留兵屯驻釜山西生浦，诡词以要中朝封贡，其实寓窥伺辽左天津之意焉……”其后，必将由东南沿海北犯，“则趋辽阳天津。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后”。^②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天津更加垂涎三尺，甲午战争时，日本就曾利用英国在天津开办的电报局为据点，进行搜集北洋水师军事情报的活动。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以日本松昌洋行职员身份为掩护，从事搜集北洋水师情报的任务。其间，他先后买通了清军驻天津护卫营弁目汪开甲和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天津军械局书办的刘芬。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清军援助朝鲜的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立即调整了兵力部署。1894年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率舰队从左世保出发，驶向朝鲜海岸，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吉野”“浪速”和“秋津洲”舰围攻的惨痛事件。舰上的清军陆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护送的北洋水师“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俘获。清军海军情报的泄密，引起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

^①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倭变事略》，上海书店1982年5月版，第156页。

^② 同上，第167~168页。

的注意，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汪开甲和刘芬先后被捕。经审讯，他们二人供出了石川伍一。结果，石川伍一被一直监视他的天津衙门抓获。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是年9月20日，石川伍一被押赴刑场，“按公法用洋枪击毙”。刘芬则“绑赴市曹”处决。有了这个案例，清政府各级官员对日本间谍才开始有所警觉。在日本间谍中，最为诡计多端的是在天津的神尾光臣。神尾光臣毕业于日本陆军教导团，1882年被派到中国搞情报，被称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之后，为获取北洋水师情报，他在天津收买了清政府军机处一位官员，导致清军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师主力配合驻朝鲜陆军作战的军事情报落入日军之手。日本大本营在得到这些情报后，立即向日军大岛旅团下令，自汉城向南开进，以逸待劳阻击清军。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原职员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天津、威海和旅顺之间，窥探北洋水师情报，给北洋水师造成极大损害。

2. 八国联军中的日军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给包括日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以沉重打击。为了扑灭中国人民的革命烈火，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起来，组成八国联军，进行最野蛮的武装干涉，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日本利用临近中国的条件，先后派兵25000人，充当八国联军的主力，扮演了“远东宪兵”的可耻角色。仅在天津一地，日本侵略军就掠得白银200万两之多。1901年9月，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起，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攫得了巨额赔款^①和在京、津、榆沿线驻兵的特权。

由于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1900年4月初，欧美各国与日本在大沽集结舰队；5月28日，驻北京的列国公使馆决议从舰队调兵到北京；31日，作为第一批先遣队，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总计450人（日军25人）的军队到达北京。随后，北京即被义和

^① 在总数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中，日本份额为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占第五位；而沙俄份额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占第一位。

团包围。6月10日,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同外部的铁路、电信联系全部被切断。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员杉山彬在外出迎接列国陆战队时,在永定门被义和团击毙。13日,义和团进入使馆区,把各国使馆围得水泄不通。

针对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声势,日本政府(山县内阁)较早制定了与各国协作联合的方针。6月8日,当英国政府置清政府于不顾,向各国提议以各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时,日本政府立即表示同意。认为“只有日本成为镇压义和团的主力,才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①为此,日本政府在得到天皇批准后,组成了2500人的“清国临时派遣部队”,任命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军队也于6月1日起陆续离开宇品港开赴天津大沽口。6月15日,八国联军开始攻击大沽炮台,日本有三艘军舰和三百余名陆战队员参加。17日,大沽炮台失陷,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天津,但由于兵力不足,日本遂主动要求增派军队。6月26日,日本决定增调国内的铁道大队与野战炮兵大队配属第五师团参加入华参战。在此期间,英国曾一再要求日本出兵增援,7月8日,英国向日本政府提议说:“日本国乃唯一为达到救援北京外国公使馆这一紧急目的能采取有效行动之国家,因此,日本若能迅速增兵,英国将提供财政的援助。”英国又向日本提议:“若日本立即再增兵二万,英国将提供援助资金一百万英镑。”^②至此,日本政府接受要求,决定派遣第五师团。7月12日又决定派遣寺内正毅参谋次长到天津与各国军方协商。7月14日,以日本福岛混成支队为主力的联军占领天津,使日军兵力迅速达到22000人,位列八国之首。火炮达54门,也位居各国前列。同时,寺内中将18日在大沽口登陆,与联军特别是俄、英、美军将领协商“互相协力向北京推进作战”。7月15日,八国联军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占领了天津。随后,为进攻北京,7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到达天津。随即,日本军部决定解散福岛支队建制,所有侵华各部队,统归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指挥。之后,日军确定了“先行占领杨村,作为进攻北京的前奏”的方针。7月底,日、俄、英、法、美、德、意、奥联军总数达到三万三千余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军),并开始进攻北京,其中,日军以杨村为出发地,与联军向北京进击,8月15日占领北京。随即在北京进行了三天的疯狂的烧杀抢掠。而作

^①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64页。

^② 同上,第65页。

为八国联军主力的日本侵略军，在这场掠夺中同样是“主力”。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日本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过程中，始终充当了“急先锋”的不光彩角色，同时为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罪恶行径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日本又将天津作为向北京侵犯的桥头堡和前进基地，利用大沽口的地理条件，协助各国军队进行登陆作战，并在其他国家在攻陷天津后取得了长期驻兵的特权。天津从此遭受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凶残肢解和奴役。

在侵占天津的战斗中，日军暴露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极端残暴的本性。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在攻打大沽口炮台中，日本海军陆战队担负掩护其他联军登陆任务，并用重炮向清军据守的炮台轰击，首先占领了炮台，随后对清军战俘进行了残酷屠杀。

日本侵略军在攻占天津城的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的丑恶角色。在攻打天津城南门的过程中，日军用重炮向城内轰击，并组成敢死队爆破城门，致使许多平民无端伤亡。在攻击海光寺的过程中，日军工兵在海光寺外的护城河上架设浮桥，之后放火烧毁附近民房。在攻打八里台时，日军不仅烧毁所有房屋，而且还炸毁桥梁，致使清军后继无援，爱国将领聂士成以身殉国。7月9日，日本骑兵在城外“扫荡”时，残酷屠杀一百余名平民，随后又在西机器局附近屠杀平民三百五十余人。

7月14日晨5时，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战后，由日本随军记者所写的《回顾八十年》中，承认日军“攻陷的过程是从南门开始，经东门、北门、西门到墙子的地方”^①。随后，日本侵略军与其他国家侵略军一起，对城内进行了大肆烧杀抢掠。当年俄国随军记者目击所记述：“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没有开着，就马上一脚踢开。”“如果抢掠被认为是一种罪行的话，那么各国士兵都毫无例外地同样地失了体面。俄军、英军、美军、日军、法军都

^① 北京市政协、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65页。

同样地进行抢掠,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流的抢掠能手。”^①与此同时,日军在进入城内后,强迫居民悬挂日本旗,还令在各家门口写上“大日本顺民”条幅,极尽侮辱之能事。

3. 瓜分天津

(1) 建立“中国驻屯军”

“中国驻屯军”是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其侵略政策的产物。早在1901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参加国,在《辛丑条约》中,与各列强共同获得了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兵权。1901年10月24日,日本陆军部正式将侵华日军定编为“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1913年,日本政府又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准备长期侵占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海光寺。因此,人们通常称之为“天津驻屯军”,中国官方文件及报刊则称其为“华北驻屯军”。“中国驻屯军”直属日本陆军部指挥,建制为师团级,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副官部、经理部、军医部、兽医部、通译部、兵器部、经济顾问部以及调查班、通讯班。其所属作战部队为:①驻屯旅团,下辖两个步兵联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电信兵联队、一个辎重兵大队;②守备队,下辖北平、天津、山海关的三个步兵大队和九个步兵中队;③宪乐队,下设警察、特务、司法三系,管辖北平、天津两个分队及天津东站、丰台、唐山、滦县、昌黎、山海关等分遣所和秦皇岛驻在所;④骑兵大队,包括军部仪仗队;⑤山炮队两个中队;⑥坦克大队;⑦航空兵三个中队;⑧汽车大队;⑨机械战队;⑩化学战队一个大队及一个实验班;⑪军犬班,包括军用鸽;⑫无线电台,计第一、第二台;⑬陆军仓库,计天津一库、二库,大沽三库;⑭军用艇一艘;⑮电话班。其司令官由日本军部直接任命,军衔为中将级。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侵略华北的最高军事机关,是日本派驻国外的四大侵略集团之一(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中国驻屯军)。从此,“中国驻屯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残害、蹂躏中国人民的凶恶机器。

(2) 日本租界的建立

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建立租界,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并

^① 北京市政协、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76页。

逐步在天津形成九国租界。日本租界在天津的设立，比英、法、美等国晚 34 年。继 1860 年英、法、美三国率先胁迫清政府在天津划定租界，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德、日两国乘清政府处于战败地位的时机，强行在天津圈占土地，设立租界。为此，日本把侵入天津称为“征服中国的咽喉”。此后，日本派出代表林董与清政府谈判，并于 1896 年 10 月 19 日在北京共同签订了《公立文凭》，明确提出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为尽快实现以上目的，1898 年 8 月 29 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天津海关道李岷琛、天津道任之弊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条约》与《另立文凭》，条约划定了日本专管租界和预备租界的范围。整个租界以海河北岸为界，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东至今和平区锦州道，西到今多伦道，面积 1667 亩。此外，条约还规定：“中国允在德租界下划一地段，为日本轮船停泊码头。”^①此后，日本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与《续立文凭》，提出在租界内建立缉捕局的要求，使日本对天津的侵略进一步合法化。

日租界划定后，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1902 年，日本擅自将今北安桥附近沿海河岸至闸口，向西拐至东南城角，再从南门直至海光寺，即今南市地区约 2500 亩土地划为扩张租界，并强迫清政府承认。此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吉和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签订了《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将今北安桥至闸口、东南角向东至多伦道约 400 亩的土地划为扩充界。至于小刘庄码头，则暂不划定，待将来需要时，再与中国政府协商解决。

经过一再“蚕食”，日租界面积不断扩大，其总面积曾达到 2150 亩。之后，日本租界当局又将墙子河以西的数百亩土地霸占，用于建造军官宿舍和日本居留民住宅。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已占有土地数千亩。

为加强对租界公共事务的管理，日本占领者在租界内建立了管理机构和一整套政策措施。1896 年中、日两国共同签订了《公立文凭》，其第一款规定：“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②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随着租界的建立和日本侨民的逐渐增多，日本随之也开始在租界建立市

^① 杨大辛编著：《天津的九国租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第 10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政管理机构。1902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并决定成立日本租界局作为日租界的管理机关。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行政委员会。1907年，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规定，行政委员会改组为居留民团，成为日租界的权力机构。这一时期，日本的侨民人数逐年增多，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推行针对中国的“大陆政策”，大肆鼓动其国民移居中国，在华北则将天津作为重点移居地区，从而使天津的日侨从1900年的88人，猛增到1940年的50072人，位居各国侨民之首。日侨在租界内从事各种职业，包括公职人员、工商业者、服务行业、医生、教师、演艺人、律师、记者、僧侣、妓女等。其中，日本浪人对社会危害极大，经常酒后外出闹事，严重扰乱了天津的社会秩序。此外，也有一些日本侨民充当了间谍和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民为敌，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部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

为维持租界内的治安，在各国租界相继成立警察机构的同时，日本也在租界成立直属总领事馆的警察机构。1902年后建立日本警察署，1928年以后，由日本国内增派四十多名警察充实天津警察署。其职责除处理刑事、民事案件，维护社会治安、交通、消防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军队搜集情报，检查抗日书籍、报刊，监视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

日租界的建立，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提供了方便条件。同时，还成为当时落魄的各派政治人物的寓居之地。在这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曾在西宫岛街（今和平区鞍山道）静园过了近七年的“寓公”生活，直至1931年11月10日被挟持到东北，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下台后曾寓居在西宫岛街与桔街（今蒙古路）交口的一幢楼房内（今和平区教育研究室）；七七事变后，一些汉奸头目如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等都将这里当作“避风港”，从事卖国活动。但也有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人物，虽暂居租界，却坚决不肯做违背民族利益的勾当。如原奉系吉林省长张作相，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徐世昌、曹锟，北洋政府秘书长张国淦，曾任察哈尔督统的王廷桢，曾任陆军总长的陆锦，曾任交通总长的朱启钤等，坚决抵制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拒绝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在大节面前保持了民族尊严。

（3）经济侵略

自近代以来，天津就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商埠，1856年第二次鸦